

『文化大革命：史實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學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三)
劉青峰編 1996發行 pp. 289~304 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

『AERA MOOK12 社会学がわかる。』

1996. 2. 10発行 pp. 174 朝日新聞 おまけ

制度の生成3



橋爪大三郎

『言語ゲームと
社会理論』

勁草書房・198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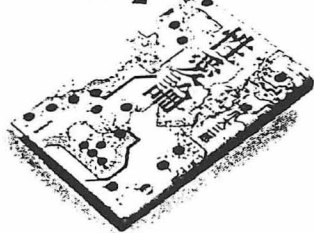
われわれを取り巻く世界は「言語ゲーム」の巨大な渦巻のようなもの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る。世界の中心をなすはずの主体の形象もその中でのみ生み出される。したがって主体が言語を掌握するのではない。むしろ逆に言語こそが主体を掌握するのだ。本書はグイト

ゲンシュタインの「言語ゲーム」の発想に依拠しつつ、さらにはハートやルーマンの法理論を援用することで、法や権力といった社会的現象の言語的成り立ちを明らかにする。いわゆる「言語論的転回」の成果をいち早く取り入れたものとして必読の一冊である。

『AERA MOOK12 社会学がわかる。』

1996. 2. 10発行 pp. 177 朝日新聞 おまけ

性愛のかたち・
家族のかたち2



橋爪大三郎

『性愛論』

岩波書店・1995年

性愛とは自分が他者の身体を欲する現象であり、人間は他の動物よりも高度で複雑な愛のかたちを持つ。本書は、この性愛をめぐる謎に社会科学的方法で迫ろうとする試みである。そこでは「性愛の分離公理」(=性愛領域が他の社会領域から隔てられていること)を軸に、猥褻か現象するのは当該社会が性愛領域を公的領域から分離したことの帰結であること、性別はイデ

オロギーであり、家族内部の分離さえ維持されれば原則的に不要なものであること、「近親相姦の禁止」は分離公理が家族内部に写像されたことの効果であることなどが明らかにされる。さらにはフェミニズムの動きに言及する中で、性愛倫理の彼岸への方向性が模索される。「性愛そのものへの切実な感心に引き寄せられた人々」に おすすめの一冊。

紅衛兵與「全共鬥」

—— 兼談60年代日本の新左翼

橋爪大三郎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社會理工學研究科

1960年代末、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齊頭並進、日本の新左翼過激集團以及「全共鬥」(「××大學全校共鬥會議」の簡稱)活動也達到高潮。二者的共同點、是試圖對冷戰體制下的世界秩序提出無法實現的異議。

一 文化大革命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則

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奇妙運動。說它奇妙，是因為它不該發生卻實際發生了。

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論述，近代政治革命包括、也僅僅表現為資產階級市民革命以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類型。中國在經過艱難曲折的革命後終於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然而，這樣的黨和國家卻受到造反的無產階級大眾的批判打倒。不該發生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而言，黨是無謬的，正如天主教徒認

為羅馬教皇是無謬的那樣。實際上，羅馬教皇也可能出錯，但因為羅馬教皇的意志是決定對錯的標準，因此他即使錯了也得權當沒錯。如果理應無謬的黨也被批判、被打倒，那麼人們必須相信有某種比黨更具權威的標準。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實現，意味着人們相信有凌駕於黨之上的權威。

如果說蘇聯共產黨曾經像俄羅斯正教的教會那樣，是創造教義、生產正統性的組織，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是家產制組織（韋伯認為傳統中國的科層制也是這種組織的典型），在這樣的組織之上有皇帝之類的權威中心並不是不可思議的。毛澤東逝世之後，鄧小平繼承了他的位置——因為中國共產黨官僚機構的運作離不開那種權威中心。

我們不妨具體探討一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這裏，首先必須從中蘇論爭談起。

中國共產黨是作為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而成立的，在形式上要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然而，導致中國革命成功的，並不是脫離實際的共產國際的指導，而是毛澤東確立的中國獨自的革命方式。因而，蘇聯共產黨的指導與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之間存在着矛盾。這種齟齬的表面化，就是中蘇論爭。

中蘇論爭的原因可能有種種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泄也可備一說。無論如何，中國給蘇聯貼上了「修正主義」的標籤，這等於公開承認理應無謬的共產黨也會犯錯。在此之前，蘇共對斯大林的批判，也無異於承認黨的錯誤。

其次，由中蘇論爭衍生出以下結果：第一、出現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具有指導世界人民的權威和正統性的主張，因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革命思想是絕對正確的。隨着中蘇論爭激化和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毛澤東的權威必然越來越加強。第二、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必須掃除修正主義（蘇聯的影響）的危機意識。如果黨也曾犯錯誤，那麼必須憑藉毛澤東的權威加以監察。從而，通過與黨組織不同的渠道來發揮這種監察功能就變成是題中應有之義。其結果是，作為

毛澤東的權威和群眾之間的紐帶的另一種「先鋒隊」——紅衛兵登上了歷史舞臺。

讓我們來考察紅衛兵運動的社會學特徵。

第一、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根據共產黨的原則，黨內的路線問題需要通過論爭來解決；在論爭開始之前，沒有誰是先天正確的。除了上下級的區別，黨員（個人）都是對等的——唯其如此，才有爭論的可能。但對紅衛兵來說，他們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打倒階級敵人為目的，故此論爭之類顯得無關宏旨。事實上，紅衛兵亦缺乏應付論爭的知識和社會經驗。他們之所以能承擔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完全是因為崇拜毛澤東，從而超越了黨員（個人）。在他們看來，毛澤東的正確性是既定的、不容論爭的。他們的鬥爭方法是着重顯示對手的非對等性（採用一切手段來侮辱對手）。

第二、紅衛兵不具備自己獨有的組織，他們是在學校、單位、地區、城市等制度性框架中組織起來的。紅衛兵雖然反對既存的黨政組織，但又以上述方式依附於它們。紅衛兵組織不能具有全國性或跨行業的形式，它們只能透過上層的調整才會實現聯合。如果由毛澤東來領導這種調整當然不會出甚麼紕漏，但問題是他不可能兼顧那麼多的紅衛兵組織。因此，最終出現了紅衛兵組織之間的武鬥。由於紅衛兵組織無須經過論爭或論證就堅信自己是正確的，而這種思考邏輯所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對手一概予以否定。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的一年內，應該打倒的既存組織還在運作，這時紅衛兵還有鬥爭目標。但是，當既存的組織後來被徹底打倒，剩下的只是各個紅衛兵組織之間的互相衝突，最終的結果是混亂和無序的不斷蔓延。

第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完成使命的紅衛兵要被下放到農村。他們既然信奉毛澤東的權威，也就無法違抗這一指示。紅衛兵自身未能建構一種與革命組織不同的、並且取既存組織而代之的制度，所以，他們在制度中的位置只能由上層的指示來決定。他們是既存組織的破壞者，在城市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結果只有被送到農村。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破壞既存的組織→下放，這就是紅衛兵三個顯著的社會學特徵。

二 日本新左翼的譜系和思想

1969年1月，東京大學在日益緊張的氣氛中迎接新年，其正門上裝飾着毛澤東的肖像。面積寬廣的本鄉校園（這裏聚集法、經、文、理、工、農、教育、藥、醫等九個院系），除了附屬醫院等部分區域外，完全被學生佔領和封鎖了。張貼毛澤東肖像的，或許是佔據了正門附近的工學院陳列館的ML派（共產主義者同盟中的毛澤東思想派）。以安田講堂為首的主要建築中，「東大全共鬥」的學生以及新左翼各派活動家正在嚴陣以待。1月18日至19日，警視廳機動隊衝進校園內逮捕學生，電視台向全國實況轉播了事件的經過。安田講堂的攻守，是東大自1968年6月15日起鬥爭擴大到全校的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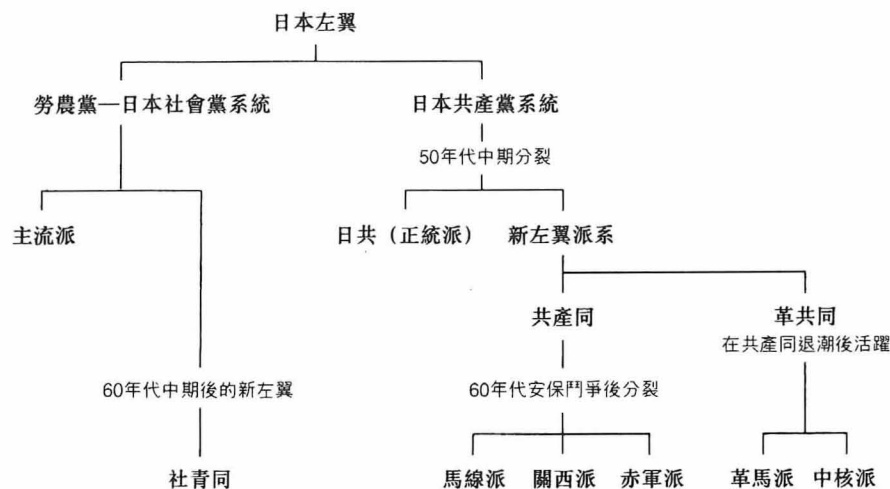
不僅僅是東大，全國主要的國立和私立大學幾乎沒有例外，都在1969年初被「全共鬥」的學生佔領了。這或許就是當時席捲世界的學生力量的日本式表現吧？

當時我是大學二年級（教養學系）的學生，也參加了「東大全共鬥」，處於運動的旋渦之中。根據我個人的體驗，東大的鬥爭既有與外國共通的因素，也有日本獨自的特徵，是兩者混合在一起的運動。

所謂「全共鬥」究竟是甚麼？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有必要概觀自1960年前後以來蔚成一大勢力的新左翼。

日本的左翼（馬克思主義者），大體上可以分為日本共產黨系統和勞農黨—日本社會黨系統。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一樣，是作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而建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鼎盛期也不過有數千名黨員而已，不久就在特別高等警察的徹底管制下瀕於瓦

60年代日本主要新左翼譜系



解。儘管如此，該黨在日本知識界一直保持着決定性的威信和影響力。

戰後，重建的日本共產黨由於得到美國佔領軍當局（GHQ）的支援而迅速發展。後來由於清共運動（red purge），日本共產黨一度被迫以非法的街頭武裝形式活動，但是從50年代中期起便放棄了這種路線。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活動家脫離日本共產黨，結成了幾個小集團。他們的宗旨是：試圖形成真正的先鋒黨，用以取代革命的叛逆者——日本共產黨。其中有兩個重要的集團，即「共產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簡稱）和「革共同」（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

在這種背景下，1960年發生了「60年安保鬥爭」。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主要的工會等日本革新勢力，為了阻止〈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改訂，在國會內外開展了強有力的反對運動。在國會兩院中佔多數的自由民主黨採取「強行表決」的方式與之對抗。連日來，以

「全學連」（「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的簡稱，是全國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聯合體）為中心的數十萬人的示威隊伍高呼「反對安保」的口號，把國會圍得水泄不通。在條約自然生效的6月15日，運動達到高潮。

當時的「全學連」又分成主流派和反主流派。日本共產黨在「全學連」內部未能獲得主導權，屬於少數派（反主流派）。指導主流派的，是志在世界革命的「共產同」。「共產同」是一個凝聚日本共產黨過去的活動家、托派份子等各派系的組織，它雖然具有把「安保」鬥爭的激情與革命的局勢結合起來的意圖，但由於組織鬆散且缺乏像樣的指導能力，最後只好聽任運動的銷聲匿迹。

在「安保」鬥爭結束後，路線上的不同導致「共產同」分裂成馬線派、關西派等許多支流（宗派），後來的赤軍派也是它的一個分支。

「共產同」退潮後，代之而起的是「革共同」。但是，由於內部路線的對立而使其分裂成兩派，即革馬符派（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和中核派。學生組織「馬學同」（「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的簡稱）和「全學連」也分化為革馬派和中核派。

與此不相涉的「社青同」（「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的簡稱）解放派，也在60年代的中期開始出場。「社青同」是社會黨的下級組織，由此分化出來的、受早期馬克思強烈影響的革命派獨樹一幟，是為解放派。它在60年代後期曾經一度與中核派、「共產同」結合，組成「三派全學連」，試圖掌握學生運動的主導權。此外，社會黨結構改革派的社會主義學生戰線（前沿派）也擁有一定勢力。

以上是60年代新左翼各派的分布情形。它們為了取代日本共產黨等舊左翼的領導地位，便不斷開展街頭行動。例如反對日韓條約鬥爭、砂川基地鬥爭、反對王子野戰醫院鬥爭等等，尤其突出的是1967年的羽田鬥爭。當時出現了戴盔蒙面、手持木棒的集團與機動隊的衝突，世間因而知道有那麼一些過激派的存在。以後，這一鬥爭方式一直被新左翼過激派保留下來。

三 「堆積的一代」與大學的大眾化

60年代的日本，不斷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遷。1960年的「安保」鬥爭，使學生和一般民眾都產生了可能被捲入戰爭的危機意識。但是，以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為點睛之筆的高速增長期，很快就將上述的危機意識沖淡了。一般市民因為能享受到繁榮的成果而感到滿足，也不認為越南戰爭會危及自身；結果，70年的「安保」鬥爭變成了一場單以相信革命形勢大好的學生為主體的運動。

學生的社會地位在這段期間也發生了變化。1960年前後的大學生普遍具有作為精英的自負，並贏得了相應的社會尊敬。但是，由於整個60年代大學的升學率急劇上升，並與戰後的生育高峰世代（所謂「堆積的一代」）的入學時期相重疊，結果使大學裏充滿了前程未卜的學生。他們一生下來就陷入競爭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既對社會持有懷疑的態度，同時又受到高速增長帶來的消費文化影響。他們已經不能用戰後時代的理想主義來約束自己。於是，「全共鬥」召喚了這樣一代「不規矩」的青年。

60年代的大學猶如各種思想攪拌在一起的坩堝，馬克思主義這時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然而，在批判舊左翼斯大林主義的背景卻出現了新的特徵：《經濟—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早年馬克思的文本引起了學生的廣泛閱讀興趣。此外，以「共產同」系統的思想家吉本隆明、革馬派的領袖黑田寬一為首的日本人士的著作也贏得了讀者；存在主義、新小說等法國的流行思潮也成為顯學。在文學方面，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等人的小說十分風行。

當時，一般學生都不大信任日本共產黨，而與中核派、革馬派等新左翼也保持距離，因為他們既不清楚各派之間的區別，又對這些派別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勾心鬥角的做法不以為然（到70年代，各宗派的內部殘殺不一而足，支持新左翼的學生寥寥無幾）。與特定的黨團、宗派無關的「越平連」（「越南和平促進市民連合」）等運動雖有學生參加，但人數也是有減無增。

然而，為甚麼日本各大學在1968年及次年，竟會紛紛成立「全共鬥」，並且獲得學生的廣泛支持呢？疏理一下當時的社會脈絡，可以歸納以下一些理由：首先，「全共鬥」是一場由那些與特定黨團、宗派等保持距離的一般學生所推行的運動。它是以大學為單位組織的，因而參加者的心理障礙較少。其次，「全共鬥」提出的要求涉及學生的切身利益（例如要求取消學生的退學處分、讓學生自己管理學生宿舍），完全不必考慮繁雜的路線論爭。第三，「全共鬥」歸根結底還是帶有左翼色彩的運動，這與當時的大環境（70年「安保」鬥爭）互相呼應。第四，「全共鬥」斷然無視程序合法性，具有實力鬥爭的一面。第五，「全共鬥」也是一場學生對自己本身存在價值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倫理運動。

「全共鬥」是由一般學生推行的自發性運動，這一點與同時期的歐美學生運動相似；但它亦有日本獨特的（也許完全是別具一格）組織性特徵。以下對此進行詳細的分析。

四 「全共鬥」是對民主集中制的逆反

60年代，許多學生都對日本共產黨的組織素質——上級一聲令下就可以造成昨是今非、方針反轉——抱有反感和厭惡。新左翼各派雖然反對日本共產黨，但在組織原理上如出一轍。例如革馬派，一方面標榜反斯大林主義，另一方面卻採取與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相同的組織模式。不過，「全共鬥」的活動卻與之背道而馳。

「全共鬥」的運動，一般都是由某個偶然的機緣自然而然發生的。它與新左翼各派處於相輔相成、若即若離的關係之中。試以「東京大學全共鬥」（「東京大學全校共鬥會議」）為例來說明這種關係。

「東大全共鬥」是1968年夏天結成的，導火線在醫學院。在醫學院，學生和教授會之間就無報酬實習制度的存廢問題，幾年來一直存

在着對立。由於教授會決定處分數名學生，包括「共產同」的活動家在內的學生們在1968年6月15日佔領了安田講堂的鐘樓——它是東大的象徵，也是大學的中樞所在。大學當局倉促要求警視廳的機動隊來鎮壓學生。機動隊的數千人員在6月17日凌晨進入東大校園，這時學生們已經逃散。

當機動隊進駐的消息傳開之後，以前無動於衷的學生們也立即罷課，源源不斷地聚集到鐘樓前，人數約有六千，佔東大學生總人數的一半。「作為學術自由的要塞的大學，豈容警察侵犯」的意識尚未泯滅。以該日為轉折點，局部糾紛一舉演變成全校性的大事。

東大十個院系的學生大會或代表大會，接連作出了罷課抗議的決議。日本共產黨系統的提案基本上被否決，通過了新左翼系統學生提議的更為激進的「無期限罷課暨街壘封鎖」的戰術。各學院各學科都成立了鬥爭委員會或罷課執行委員會。儘管這些組織中混雜着新左翼各派的許多活動家和擁護者，但是大多數學生迄未參加過任何學生運動。作為這些組織的聯合體而成立了「東大全共鬥」，由物理學院的研究生山本義隆（他本來是與運動無緣的）擔任委員長。「全共鬥」領導東大門爭達半年多，次年一月被機動隊驅出安田講堂，以後逐漸解體。

在左翼的自發性造反組織這一點上，「全共鬥」看起來與紅衛兵十分相似；然而，細心比較兩者的思想和組織原則，又可以發現許多不同點。讓我們來證實這個說法。

當時，多數學生對日本共產黨以及新左翼各派的引導（乘具體鬥爭之機擴大組織）和山頭主義已經感到厭煩了，「全共鬥」為了避免既存黨派的干涉，特意採取了與它們截然相反的組織原則。這些原則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條：

(1) 不確定誰是「全共鬥」的成員。學生可以隨時參加或退出「全共鬥」。「全共鬥」向大學當局提出的撤銷處分等七項要求，是唯一可以被稱作綱領的東西。「全共鬥」舉行甚麼集會或活動，參加者就是「全共鬥」。

(2) 通過有關人員的討論和全體一致通過的方式進行決策。在對某一問題作出決定的場合，進行反覆而徹底的討論，直到沒有異議為止。不採取多數表決。原則上任何會議都公開進行，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全體會議的參加者是各組織的「代表」，但嚴格說來他們並非「代表」，只不過是聯絡人而已。因為在「全共鬥」中不存在誰代表誰的關係，只有自己能夠代表自己。

(3) 不存在任何上級對下級的指令。全體的決定要向各組織傳達，但由於它不是指令，可以不服從。亦即是說，各組織、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判斷是否要按決定來行動。「全共鬥」歸根結底只是自發的各個人的集合（在這一點上，「全共鬥」與作為自治會的集合物的「全學連」不同）。

由此可見，「全共鬥」基本上不是科層組織。它雖然產生了諸如「全體決定的事情，部分不得推翻」、「成員之間不作任何區別」等自發性規則，但僅此就能維持一個經常擁有數千人的集團，實在不可思議。

「全共鬥」的組織原則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翻轉了，這種做法是怎麼想出來的呢？也許像天安門廣場學生那樣自發的群眾運動的場合，這種組織原則是司空見慣的，但另一種可能性則在於日本的傳統。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平安時代，僧兵們手持武器舉行了滿寺集會，然後舉行了示威遊行，並與負責首都警備的武士們發生了衝突。從中世紀的僧兵到近世的農民起義的遙遠記憶，也許在「全共鬥」中蘇醒了。

五 民主主義與暴力

「全共鬥」對教室進行了街壘封鎖，使講課無法進行。它們後來更把戰術擴展為「全校街壘封鎖」，以致研究室和辦公樓也關閉，大學陷於癱瘓。

封鎖與其說是手段，毋寧說是目的。當時，新左翼各派在王子、羽田、防衛廳周圍等區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街頭鬥爭，並圖謀組織的發展。即使與機動隊推推搡搡，把夠格的革命家扮演得有聲有色，可是一旦回到大學，仍然得過日常的生活。在「60年安保」鬥爭中大顯身手的學生們，在經歷了「挫折」和「變節」之後，豈不是都到企業裏就職了嗎？這種鬥爭無非是一片假象——多數學生這麼想。因而，必須在自己具體的生活脈絡中為變革而組織鬥爭，把學生們的生活場面轉換成非日常的空間，為此，封鎖是必要的。

基於同樣理由，「自我否定」成為「全共鬥」的口號——否定那個被上大學的考試浪潮所吞沒、毫無反思地要當資本主義社會的齒輪的自己。這種集體性的自我變革運動，就是「全共鬥」的含意。它不是政治運動，而是所謂思想運動。因此，儘管運動提出了具體的鬥爭目標，但始終無法與大學當局達成妥協。任何大學的「全共鬥」均無例外，都得面對被機動隊鎮壓而敗走的命運。

另一個問題是，「全共鬥」對暴力採取了甚麼態度？

新左翼各派（除前沿派外）都反對日本共產黨放棄暴力革命的路線，他們奉暴力革命為宗旨。於是，他們採取了頭戴鋼盔、面覆毛巾、手持木棒與警察機動隊相衝突的鬥爭方式。投石塊、揮木棒當然不能完成革命，但是人們認為這種戰術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全共鬥」採納了新左翼的鋼盔加木棒的鬥爭方式，因為它並沒有否定暴力（憑藉實力進行鬥爭）。「全共鬥」無限期罷課加封鎖的戰術，是以自治會的學生大會和代表大會的決議（反映學生多數意見的民主程序）為根據的。但是，「全共鬥」批評學生自治會的做法是把程序絕對化，因而要求把一切權力集中到作為「戰友」集合體的「全共鬥」。即使「全共鬥」成了少數派，也要憑藉實力把街壘封鎖堅持到底。反對無限期罷課的學生都被指責為自我否定不夠徹底者，因而「全共鬥」的態度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正是這種決心和信念支持了「全共鬥」的「暴力」。

可以說，「全共鬥」的暴力矛頭指向以下三個方面：(1) 大學當局，(2) 敵對勢力(特別是日本共產黨系統的學生組織)，(3) 自己本人(否定自己的內心世界)。「全共鬥」與共產黨系統的學生也接連發生好幾次衝突，但僅限於組織性行使實力，並沒有發生過以個人為目標的無區別性恐怖活動。總的說來，「全共鬥」的暴力是觀念性的、象徵性的。在這一點上，它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為實踐真正的階級鬥爭而投身武鬥的紅衛兵是不同的。

為了爭奪70年「安保」鬥爭的主導權，當時新左翼各派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全共鬥」抑制了事態的惡化。在新左翼各派看來，「全共鬥」是發展自己成員的最佳場合，因而不希望與「全共鬥」搞壞關係。在「全共鬥」看來，示威遊行和街壘是它們的拿手好戲，因而一旦有事能夠派遣外來盟軍(其他大學的聲援隊伍)的新左翼各派彌足珍貴。在這裏，兩者的關係是既相輔相成又互相限制。

例如，以早稻田大學的內訌為導火線，東大在1968年9月也出現了解放派與革馬派的衝突，鬧得沸沸揚揚。後來由「全共鬥」出面仲裁，警告兩派如果繼續內訌就禁止它們的進出，事端才得以平息。雖然各派處於互相敵對的關係，但在「全共鬥」存續期間，它們尚沒有公然強行宗派利己主義。

由於「全共鬥」是以大學為基礎的運動，因此在被機動隊掃地出門和全校復課後，便不能作為運動而存續。新左翼諸派遂拋棄「全共鬥」，重新開展各自的運動。

六 赤軍派、連合赤軍以及炸彈集團

新左翼各派把70年「安保」鬥爭作為最大的政治目標。1960年的「安保」鬥爭沒有導致革命，被歸咎於先鋒黨未進行適當的指導。各派都自稱，只有本派才能在70年發揮先鋒指導的作用。

但是，1970年的「安保」鬥爭注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首先，1970年的前哨戰——「全共鬥」運動潰滅了。其次，1960年改訂的(需要國會批准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在1970年自動延期，根本無須國會的討論和表決。再次，此時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也與60年代的不同，它們已經無意認真進行安保鬥爭。此外，60年代的高速經濟增長使國民得到滿足，對於學生的革命夢想已失去了興趣。最後，機動隊的警備壁壘森嚴，把新左翼各派給完全壓制住了。

一籌莫展的新左翼各派，只好把目標轉向反對建設成田機場等運動上去。成田鬥爭的意義是曖昧的，但是由於這場運動是以農民作為主體，故此容易開展街頭行動。

此外，中核派、解放派、革馬派等等的內訌也紛至沓來，各派的頭頭和基層活動家都遭到反對派的襲擊，他們或被殺害、或負重傷。血腥復仇愈演愈烈，新左翼開始被看作可怕的殺人集團。各派要在大學裏發展新成員已經很難了。至70年代，使人們與新左翼徹底決裂的事件接連發生。

最初是赤軍派劫持約鐸號飛機的事件。

一直呼籲全世界同時革命的赤軍派，在山區進行武裝訓練時被一網打盡。於是，剩下的幹部在1970年3月，脅迫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約鐸號連同乘客一起飛往北朝鮮，試圖逃亡，這就是約鐸號劫持事件。由於在日本國內看不到革命的可能性，他們只有寄希望於巴勒斯坦和北朝鮮。

連合赤軍的阿薩瑪山莊事件帶來了更大的衝擊波。

1972年2月，由赤軍派的餘黨和激進的小集團京浜「安保共鬥」合併而成的「連合赤軍」，挾持着人質一起據守療養所——阿薩瑪山莊，並與包圍的警察隊伍展開了槍擊戰。後來搜索發現，在山區地下指揮部中，竟然掩埋着多名遭到同志殺害的屍體。這一事件的特異之處在於：連二十人都不到的小集團，竟要認真準備實行革命(武裝起義)；而且當中有人以革命犧牲的精神不足為理由，把另一些夥伴都

殺害了。即使成為少數者也要追求革命的理想，以這樣的新左翼邏輯推演下去，最終不能不導致上述結局。當一直同情新左翼的人們切身體會到這一點時，不禁愕然。

此外，還有三菱重工爆炸事件。

1974年8月，不知何人安置的手工自製炸彈，在東京大手町的三菱重工總部大樓爆炸，造成了八人死亡和大量的負傷者。經過偵查，逮捕了人數不多的無政府主義集團——「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犯人中有一個是我的初中同學，他因「全共鬥」的影響而較晚進大學。由於要拒絕資本主義社會，又要獨善其身和自我淨化，這兩種情感促使他參加了無區別性恐怖活動。不擇手段地把自己的信念付諸行動，其結果是使他成為爆炸犯。自己的信念真是那麼正確的嗎？從此，不少人開始懷疑左翼的價值觀、世界觀。

可以說，這一連串事件斷送了新左翼、「全共鬥」之類的「左派」的前景。

當然，新左翼和「全共鬥」不能等量齊觀。新左翼各派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由先鋒黨指導革命），只是因為日本共產黨放棄了先鋒黨的職責，它們才打算取而代之。在這一點上，他們雖名為「新」左翼，但其實並沒有甚麼新穎之處。與此不同，「全共鬥」已經不再承認有先鋒黨的必要，甚至認為即使沒有先鋒黨的指導也可以革命。（儘管如此，它沒有否定自詡為先鋒黨的新左翼各派的存在價值，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確是不徹底的。）

如果試圖在沒有先鋒黨的情況下進行革命，其結果是要麼無視大環境而把自己封閉到小集團——公社的實驗中去，否則只有以小集團的革命意志衝擊大環境。前一種嘗試曾出現過無數次，終究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後一種的極端表現則是連合赤軍以及爆炸恐怖活動集團。因此，「全共鬥」不僅被機動隊鎮壓了，它在思想上也到了山窮水盡。

在60年代的日本，紅衛兵的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肯定。人們誤認

為，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仍然有革命的可能，那麼一定是來自與僵化的黨政官僚進行鬥爭的不斷革命的抱負以及每個人的自律意志。但是實際上，文革不過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個人崇拜的產物。在新左翼和「全共鬥」中，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被認為是當然的前提，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實情是始料不及的。

七 紅衛兵與新左翼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日本的新左翼及「全共鬥」之間，雖說是相似點少、不同點多，但由於同處一個時代，還是可以找出一些共通之處。

第一、兩者都以美蘇冷戰結構為前提，對蘇聯的作用表示異議。

有關中蘇論爭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本文一開始已經述及。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依次嘗試了三種經濟發展的策略：(1) 向蘇聯學習—(2) 自力更生—(3) 引進外資。文化大革命（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存在於中國國內的權威的嘗試），發生在第二個階段之中。

冷戰（美蘇力量均衡）是一種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公式的事態。新左翼不僅否定日本共產黨的權威，而且也否定蘇聯共產黨的權威。由於美蘇搞均衡，蘇聯（看起來）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標。所以，新左翼有必要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這就是反斯大林主義。可是，中國對批判斯大林持保留態度，因為它正實行着斯大林主義。不過，在否定冷戰中蘇聯的正統性這一點上，它與新左翼相同。

第二、與前一種傾向相對應，反美的因素相對弱化。

在文革初期，中國試圖把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擴大到全世界，並描繪了以第三世界包圍發達國家（美國）的世界革命藍圖。當毛澤東認定蘇聯為主要敵人而決心恢復中美外交關係後，這一圖式被修

正。這意味着中國優先選擇民族主義，而犧牲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對於一旦日本和美國結成軍事同盟，日本革命就幾乎沒有指望這樣的事實，日本的新左翼似乎沒有進行正面的研究。赤軍派通過蛻變為國際游擊組織的方式，實際上放棄了日本革命。其他各派，則把革命前途渺茫的現狀歸罪於異己黨派的反革命的背叛行徑。如果冷靜地加以思考，把階級鬥爭與反美民族主義相結合，不失為日本革命的一種可能性。但是這與日本共產黨的路線雷同，所以未被各派採納。

第三、兩者都是僅僅基於群眾造反的運動。

文化大革命，既打倒了嚴格按照計劃經濟教科書行事的蘇聯派和修正主義者，也打倒了嘗試市場經濟實驗的走資派和現實主義者。在美蘇對立的夾縫中經營國家的黨政官僚，只能在上述兩種可能性中進行抉擇。如果把黨的機構完全破壞了，那麼正確性的標準必然取決於超越黨的毛澤東，以及擁護毛的領導的一般群眾。的確，毛的指示和權威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沒有群眾的擁護，它也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力量。

「全共鬥」否定了黨派（先鋒黨）的存在價值，但它相信革命的理想。因而，群眾只有在沒有黨派領導的狀況下自發奮起。這樣的群眾，只有在大學裏才找得到。

由此看來，無論是紅衛兵的文化大革命還是日本的新左翼、「全共鬥」，都可以被視為在世界革命的能量為冷戰之壁所阻隔的期間，在一國內部追求純粹的革命理想的運動。然而，兩者都因脫離現實、缺乏革命的條件而自消自滅，在整天熱衷於暴力活動的過程中失去了人們的信賴。

季衛東 譯

橋爪大三郎の社会学講義 2

橋爪大三郎著（夏目書房・2000円）

『社会学講義』に入る前の、文字通りの「講義にはいる前に」と題した前置きの冒頭で著者は書いています。「日本は、もともと、場所にとしかかたど思つた」。

おそら、これは、この時代を生きつゝ多くの人の実感だろう。時代は、日本は、おきろくに大きな曲の角を曲がらた。それに伴つてさまざまな矛盾や問題も吹き出している。が、そういう事態の前で、私たちは手も足もなしに立ちつゝしている。一つひとつの事態が、まわつて具体的で緊密な（そのうち最終的視座をもち）判断を私たちに求めている。にもかなわらず、この判断と実践が一人一人の心にとどまらず、政治家や官僚や企業家や、あるいは知識人といった国のリーダーたちだけの問題ではない。それは同時に、私たちが自身の直接的で間接的でもたらさぬ問題となつてきている。ところが、この時代の、この日本のやがていふところである。なぜ、こんなことになつたのか。

一年前に出された『橋爪大三郎の社会学講義』に載つたのは第二講なのだが、前作同様ここでも橋爪の「講義」は、まわつて明解で筋が通っている。

なぜ、日本株式会社はうまくいかなつたのか。なぜ、日本人はここまで自尊心をなくしてしまつたのか。なぜ、日本人は自分の歴史を失つたのか。過去の台湾、朝鮮統治に対して、私たち日本人はどう考えればいいのか。憲法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は、危機管理は、大学（教育）は、私たちの生活は、

こうしたさまざまな命題、本質的に同時にチャーナリステックでもある命題に、著者は、まっすぐに問い合はう。問題のもともとのところ、その故こつてきたところを立ち返り、その地

帯から、現在の問題をわがらみずく解きあかそうとする。むしろ、ここに全ての質が用立てられてはいるわけはない。そうではなく、私たちが道を問ひつゝための道筋が、そのための基本的なステップの取り方が、だれでもわかる講義に整理されている。

社会学著と見る著者は、第一の講義を「社会学を学ぶだけにあらず」と題して、社会学とは何か、その学問としてのあめから解きあかすのだから、そこには象牙の塔（ハイコトベ）にこもりながら学問を、現実の私たちの生きている社会の中で生かす方法を問ひたい、それだとしてその「社会学」だ、と自ら問いかひをたてておられた。このわけ、このうらなひした時代、転形期にして、学問は学問として自己完結するのではなく、むしろ時代をトクする形でチャーナリステックな働き（役立ち度）をしつゝ。

だからこれは、まさに学生に与える書といつた体裁は取つてはいるが、実は、最も今日の、さほどには未来的な、この日本という国を構想しつゝための手がかりをもとに考へるための講義である。

「現代の日本人は、精神的に未熟である。そう思つて仕方がない。それは、一人ひとりの人格のなかに、個人としての自己と、国民としての自己とが、併立して存在していないからである。別の言い方をすれば、西洋を関係づけるはずの歴史をわれわれが失ひ、個人と国民を同時に自己のなかに抱えあつ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ないからである。歴史を失つたということは、文化を失ひ、国家を失ひ、人間の尊厳を失つたということなのだ」

いかにいえば、これは、もう一つの日本人論であり、まともな日本人になるための人間論、といつて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

日本という国を構想する道筋を示す

おまけ 毎日新聞 1997年（平成9年）6月15日（日曜日）

新刊本・いろいろ・紹介

紅衛兵と全共闘

——日本六〇年代新左翼の運動と組織——

橋爪大三郎

一九六〇年代の末、ちょうど中国の文化大革命と並行して、日本では新左翼過激派、ならびに全共闘の活動がピークを迎えていた。両者はどちらも、冷戦体制下の世界秩序に対する、実現不可能な異議申し立てだったという点で共通する。

1. 文化大革命は、マルクス主義の原則に反する

一九六六年に毛沢東の発動したプロレタリア文化大革命は、誰もが認めるように、かつて例のない奇妙な運動だった。

どこが奇妙かと言えば、それが、あるはずのない革命だったことである。マルクス主義の公式見解によれば、近代の政治革命には、ブルジョワ市民革命、そして、プロレタリア社会主義革命の二つが（そして二つだけが）あ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た。中国は、革命の結果曲がりなりにも社会主義国家を樹立し、中国共産党の指導のもと、社会主義建設に邁進していた。その党と政府が、蜂起したプロレタリア大衆によって批判され、打倒された。あるはずのないことが、起こったのである。

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の原則から言えば、党は無謬である。それは、カトリック教徒にとってローマ教皇が無謬であるのと同じである。実際問題として、ローマ教皇も誤りは犯すだろうが、誤りがあってもそれは誤りで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なぜなら、ローマ教皇こそが、何が正しく何が誤っているかの規準だからだ。

無謬であるはずの党を批判し、打倒してしまうとしたら、どこかに党よりも権威のある規準が存在すると思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文化大革命が起きたということは、人びとがそう信じたことを意味する。ソ連共産党がロシア正教の教会（そのなかでドグマを生み

出し、正統性を生産する組織）だったとすれば、中国共産党は家産官僚制（M・ヴェーバーによれば、伝統中国の官僚制もその典型）の組織だったのであり、その外側に皇帝（権威の中心）がいても不思議はなかった。毛沢東なきあと、鄧小平がその位置を継ぐことになったのは、中国共産党の官僚機構がそもそもそうした存在を必要とするように出来ていたからだ、と考えられる。

*

毛沢東がなぜ文化大革命を発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かを、もう少し考えてみる。まず、その前提として、中ソ論争をあげ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コミュニスト・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コミンテルン）の中国支部として出発した中国共産党は、コミンテルンの指導を受けるのが建前である。けれども中国革命を成功に導いたのは、コミンテルンの指導（実態と合わなかった）でなしに、毛沢東の編み出した中国独自の革命方式だった。ソ連共産党の指導と、中国共産党の威信とは、矛盾する。この違いが、中ソ論争として表面化した。

中ソ論争の原因はいろいろに解釈できるが、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発露ともみることが出来る。ともかく中国は、ソ連に「修正主義」のレッテルを貼った。無謬であるはずの共産党が、誤りうるということが公認された。（ソ連の側でも、それに先立ってスターリン批判が起り、同じく党の誤りが公認されている。）

ここから、いくつかの帰結が生ずる。第一に、中国共産党こそが、世界人民を指導する権威と正統性を有するという主張。それはなぜかと言えば、中国共産党を指導する毛沢東の革命思想が、絶対に正しいからである。中ソ論争が激化し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が高揚すればするほど、毛沢東の権威が必然的に高まっていく。第二に、中国共産党の内部から、修正主義（ソ連の影響）を一掃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危機感。党が誤りうるのであれば、それを毛沢東の権威によってチェック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して、このチェック機能は、党組織と別のルートで果たされる必要がある。そこで、毛沢東の権威を人びとのあいだに媒介するもうひとつの「前衛」として、紅衛兵が登場することになった。

*

紅衛兵運動の、社会学的な特徴を考えてみよう。

まず、毛沢東に対する個人崇拜。共産党の原則は、党内の路線問題を論争によって決着することである。論争を始めるまえに、誰かがア priori に正しいということはありえない。党員は、（上級／下級の違いを別にすれば）人間として対等である。だから論争が成

立する。いっぽう紅衛兵の場合、論争などどうでもよく、毛沢東の指示にもとづいて階級の敵を打倒することが目的だった。紅衛兵には、論争にたえるだけの知識も社会経験もない。彼らが文化大革命を担うことができたのは、党員（人間）を超えた存在として、毛沢東を崇拜していたからだ。彼らにとっては、論争するまでもなく、毛沢東が正しさに決まっていた。彼らの闘争の方法は、相手が対等な人間でないことを示すこと（あらゆる手段を使って相手を辱めること）に力点があった。

第二に、それ自身の独自の組織を持たないこと。紅衛兵は、学校、職場、地域、都市といった制度的なまとまりごとに、組織された。それは、党・政府といった既存の組織に反対するけれども、実はそういう仕方で既存の組織に依存している。紅衛兵組織は、もともと互いに関係がないから、上部の誰かが調整した場合にしか連合できない。毛沢東が調整すれば問題ないが、無数の紅衛兵組織をすべて毛沢東が調整するなど不可能である。調整がつかなければ、とどのつまりは武闘となる。紅衛兵組織は、論争抜き（論証ぬき）に自分正しいと信じているので、相手を否定するしかないからだ。文化大革命のすべり出しの半年か一年、打倒すべき既存の組織があったあいだは、うまく行った。既存の組織が打倒されてしまうと、あとは紅衛兵組織同士がぶつかりあうだけ。混乱と無秩序が広がっていく。

第三に、下放されたこと。役割を終えた紅衛兵は、毛沢東の指示で、農村に送られた。毛沢東の権威を信奉する彼らは、この指示を拒むことができない。紅衛兵自身が（革命組織と違って）既存の組織に代わる制度をこしら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以上、上からの指示によって彼らを制度のどこかに位置づけるしかない。既存の組織の破壊者であった彼らは、都市のどこにも位置づかず、結果的に農村に送られるしかなかった。

毛沢東個人崇拜↓既存の組織の破壊↓下放。この三つの社会学的特徴によって、紅衛兵は際立っている。

2. 日本新左翼の系譜と思想

一九六九年一月。新年を迎えますます緊迫する東京大学の正門に、毛沢東の肖像が飾られていた。広い本郷キャンパス（法・経・文・理・工・農・教育・薬・医の九学部を擁する）は、附属病院など一部を除いて、学生たちによって完全に占拠・封鎖されている。そのうち、正門に近い工学部列品館を占拠したML派（共産同Ⅱ後述Ⅱ）のなかの毛沢東思

想派）が、さきの肖像を掲げたのであろう。安田講堂をはじめ主要な建物には、東大全共闘の学生や、新左翼各セクトの活動家が籠城している。一月一八日～一九日には監視庁機動隊が構内に突入して学生たちを逮捕、その模様は全国に終日テレビ中継された。

安田講堂の攻防戦が、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五日から全学に拡大した東大闘争のピークだった。東大だけではない。日本有数のマンモス大学・日大をはじめ、主要な国立大学・私立大学はほぼ例外なしに一九六九年初め、全共闘の学生たちによって占拠されていた。

これは、世界を同時に巻き込んだステューデント・パワーの、日本版だろうか？ 一九六八年当時、大学二年生（教養学部の学生）だった私は、東大全共闘に加わり、東大闘争をその渦中で過ごした。その経験から言えば、外国にも共通する要素と、日本独自の要素が混ざりあった運動だったと思う。

それでは、全共闘（〇〇大学全学共闘会議の略称）とは何か？ それを説明するにはまず、一九六〇年前後から大きな勢力となった、いわゆる新左翼について概観しなければならぬ。

日本の左翼（マルクス主義者）は、日本共産党系と、労農党↓日本社会党系とに大別される。日本共産党は、中国共産党と同じくコミンテルンの日本支部としてスタートした。

戦前は、その最盛期でも数千人の党員をかぞえたにすぎず、まもなく特別高等警察の徹底した取り締まりによって潰滅状態とな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同党は、日本の知識界に決定的な威信と影響力を保持し続けた。

戦後、再建された日本共産党は、占領軍（GHQ）の後押しをえて急拡大した。その後レッドパージにあい、火災瓶闘争など非合法活動に走るが、五〇年代の半ばには過激な武装闘争路線を放棄する。この過程で多くの活動家が日本共産党を離れ、いくつかの小グループに結集した。革命の裏切り者・日本共産党の代わって真の前衛党を形成しよう、というわけである。そうしたグループとして、共産同、革共同の二つが重要である。

そんななか一九六〇年に、「六〇年安保闘争」が巻き起こった。日本社会党、日本共産党、主要労働組合など日本の革新勢力は、日米安保条約の改訂を阻もうと、国会の内外で強力に反対運動をくり広げた。両院で多数を占める自由民主党は、「強行採決」でこれに応じた。条約が自然成立する六月十五日をピークに、全学連（全日本学生自治会総連合Ⅱ）全国の大学学生自治会の連合体）を中心とする数十万のデモ隊が「安保反対」を叫び、連日国会周辺を埋めつくした。

当時の全学連は、主流派と反主流派に分かれていた。日本共産党は全学連内部で主導権がえられず、少数（反主流派）に留まっていた。主流派を指導したのは、世界革命を志向する共産同（共産主義者同盟）だった。共産同は、日本共産党の元活動家やトロツキストなどさまざまな系統の人びとを集めたルーズな組織で、安保闘争の高揚を革命的情勢に結び付けようと意図しながら指導らしい指導もできないまま終わってしまった。

共産同は安保闘争が終わると、路線の違いから、マル線派、関西派など多くの分派（セクト）に分裂した。のちの赤軍派も、共産同の一分派である。

共産同の退潮に代わって、革命的共産主義者同盟（革共同）が勢力を拡大した。だがすぐに路線対立から、二派に分裂する。革命的マルクス主義派（革マル派）と、中核派である。学生組織（マルクス主義学生同盟＝マル学同）や全学連も、革マル派、中核派に分かれた。

これとは別に、六〇年代半ばから、社青同解放派が登場する。社青同（社会主義青年同盟）は社会党の下部組織で、そこからの分派（初期マルクスの影響の強い革命派）がセクトになった。この社青同解放派と、中核派、共産同は、六〇年代後半に一時期共同行動をとり、「三派全学連」を結成して学生運動の主導権を握ろうとはかった。ほかに、社会党・構造改革派の社会主義学生戦線（フロンテ）も、一定の勢力をもっていた。

以上がおおまかな、六〇年代新左翼各派の配置である。これら多くのセクトは、日本共産党など旧左翼に代わって運動をリードしようと、つぎつぎに街頭行動を繰り広げた。日韓条約反対闘争、砂川基地闘争、王子野戦病院反対闘争などである。なかでも転機となったのは、六七年の羽田闘争であろう。このとき、ヘルメットに覆面、手に手に角材をもった集団が登場して、機動隊と衝突、過激派の存在を世間に知らしめた。以後この闘争スタイルが、新左翼過激派の定番として定着していく。

3. 「団塊の世代」と大学の大衆化

六〇年代の日本は、急激な社会変動を経験しつつあった。六〇年安保闘争のときには、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危機感が、学生にも多くの一般市民にも共有されていた。だが、一九六四年の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をハイライトとする高度成長のあいだに、そうした危機感は急速に薄れていった。一般市民は、繁栄の成果を享受できることに満足し、ベトナム戦争を身近な危険とは思わなかった。七〇年安保闘争は結局、革命的情勢が

開けると信じる、学生を主体とする運動になっていた。

学生の社会的地位も変化した。六〇年ごろまでの大学生は、エリートとしての自負を持ち、それなりの尊敬を集めていた。しかし、六〇年代を通じて進学率が急上昇した結果、戦後のベビーブーム世代（いわゆる「団塊の世代」）の進学時期とも重なって、大学には将来を約束されない大勢の学生があふ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彼らは、生まれたときから競争にもまれ続け、この社会に不信を抱いているいっぽう、高度成長のもたらした消費文化の影響を受け、もはや戦後流の理想主義によって自分を律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こうした「無規範」な青年たちに訴えたのが、全共闘であった。

*

六〇年代の大学は、混乱した思想のつぼの様相を呈していた。マルクス主義の影響力は依然として大きかったが、旧左翼・スターリン主義を批判する文脈から、『経哲草稿』や『ドイツ・イデオロギー』など初期マルクスのテキストがよく読まれたのが、この頃の特徴である。共産同系の思想家・吉本隆明、革マル派の指導者・黒田寛一をはじめ、日本人の著作も読まれた。実存主義やヌーヴォー・ロマンなど、フランスの新思想も人気であった。小説では、大江健三郎や三島由紀夫などがよく読まれていた。

平均的な学生は、日本共産党に不信の念を抱いていたが、中核や革マルなどの新左翼にも距離を置いていた。各派の違いがよくわからないように、ささいなことでも小競り合いをくり返していたからである。（七〇年代になると、セクト間の内ゲバ殺人が続発し、新左翼を支持する学生は例外的となってしまう。）特定の党派やセクトと関係のない、ベ平連（ベトナムに平和を・市民連合）のような活動なら参加するという学生も、少なくなかった。

一九六八年から翌年にかけて、日本中の大学で、全共闘があれば数多く組織され、幅広い支持を集めたのはなぜか？ ここまでの背景を整理して、いくつかの理由を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ずそれは、特定の党派やセクトから距離を置いた、ふつうの学生による運動だった。全共闘は、大学ごとの組織だったから、参加するのに心理的な抵抗が少なかった。つぎにそれは、手近な要求（学生の退学処分を取り消せとか、学生会館を学生に管理させるとかいった要求）を掲げていたから、複雑な路線論争を考えないですんだ。第三にそれは、にもかかわらず、あくまでも左翼的な運動、どこかで大状況（七〇年安保闘争）をにらんだ運動であった。第四にそれは、手続きの合法性をあえて無視する、実力闘争としての側面ももっていた。第五にそれは、学生が自分自身の存在を批判的に問い直す、倫

理的な運動でもあった。

全共闘は、自然発生的な、活動家でない一般学生の運動だったという点で、同時期のヨーロッパやアメリカの学生運動と似通っている。けれども同時に、日本独特の（おそらく類例のない）組織的な特徴を持った運動でもある。この点を、詳しく検討してみよう。

4. 全共闘は、民主集中制の裏返し

六〇年代、多くの学生は、日本共産党の組織体質に対する反感や嫌悪——昨日までの方針が、上部の指令で一夜にしてひっくり返ってしまうこと——を共有していた。新左翼の各派は、日本共産党に反対していたが、組織原理は似たようなものだった。たとえば革マル派は、反スターリン主義を掲げているものの、組織の作り方は共産党の民主集中制とそっくりである。いっぽう全共闘は、これを裏返したかたちになっている。

全共闘の運動は、偶然のきっかけから自然発生的にスタートするのが一般的だった。そして、新左翼各派とはもちつもたれつ、つかず離れずの関係にあった。東大全共闘を例にして、この関係を説明しよう。

*

東大全共闘（東大闘争全学共闘会議）は、一九六八年の夏に結成された。

東大闘争の発火点は、医学部である。医学部では、研修のやり方（無給インターン制度の廃止）をめぐる、学生が医学部教授会と数年越しの対立を続けていた。教授会が、学生数名を処分したので、一九六八年の六月十五日、学生たち（共産同の活動家を含む）は安田講堂の時計台（東大の象徴であり、大学本部もある）を占拠した。あわてた大学当局は、警視庁の機動隊に学生の排除を要請。数千の機動隊が六月十七日の未明に東大構内に入ったが、学生たちは逃走したあとだった。

「機動隊導入」の報が伝わると、それまで関心のなかった学生たちもすぐさま授業を放棄して、続々と時計台前に集まってきた。その数約六千、東大の学生の半数に及ぶ。「学問の自由の皆、大学に警察が入っ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意識が、まだ生きていた。その日を境に、紛争は一挙に全学化した。

東大にある十の学部、学生大会や代議員大会が、つぎつぎ抗議のストライキを決議した。日本共産党系の提案はおおむね否決され、新左翼系の学生が提案するより過激な「無期限スト・バリケード封鎖」戦術が採択された。学部、学科ごとに、闘争委員会やストラ

イキ実行委員会が作られた。これらの組織には、新左翼各派の活動家やシンパも大勢混じっていたが、これまで学生運動に縁のなかった学生が大部分だった。物理学の大学院生だった山本義隆（彼もそうした学生のひとりだった）が議長となり、これらの組織の連合体・東大全共闘が成立した。この組織は、半年余にわたって東大闘争を主導したあと、翌年一月には機動隊によって安田講堂から排除され、以後、解体への道をたどった。

全共闘は、左翼系の自発的な造反組織という点で、紅衛兵と似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けれども、その思想や組織原則を比較してみると、異なっている点が多い。それを検証してみよう。

*

全共闘は、既存の党派に干渉されないために、わざわざそれと正反対の組織原則を採用した。多くの学生たちは、日本共産党や新左翼各派のひき回し（個別の闘争を組織拡大のために利用すること）・組織エゴに飽き飽きしていた。そうした原則の主なものを、箇条書きにしてみれば、

(1) 誰が全共闘のメンバーであるかを、確定しない。……学生たちは、いつでも全共闘に加わり、いつでも辞めることができた。全共闘は、大学当局に、処分の撤回など七項目の要求を掲げていたが、それが唯一の綱領とも言えるものであった。何かの集会や活動があれば、その日・その場に集まった人びとが、全共闘であった。

(2) 関係者の討論と全員一致で、ものごとを決定する。……何かを決定する場合には、異論がなくなくなるまで徹底的な討論を繰り返した。多数決はとられなかった。どの会議も、原則として公開されていて、誰でも参加できた。全体会議には、各組織の「代表者」が参加したが、厳密に言えば彼らは「代表者」でなく、連絡係にすぎなかった。なぜなら全共闘には、誰かが誰かを代表するという関係がなく、自分は自分を代表できるだけだったからである。

(3) 上部から下部への指令は、一切存在しない。……全体の決定は、各組織に伝達されたが、それは指令でないから、従わないこともできた。決定のとおり動くかどうかは、各組織・各人の判断にまかされた。全共闘はあくまでも、自発的な諸個人の集まりだった。（この点、自治会の集まりだった全学連と異なる。）

このように、全共闘はおおよそ、官僚組織ではなかった。「全体で決めたことを、一部で

覆さない」「メンバーのあいだに、どんな区別ももうけない」など、自発的な規則がいくつか生まれたが、それだけで常時数千人を擁する集団が維持できたのは不思議なことだった。東大以外の多くの大学でも、同様の全共闘が生まれたのは不思議なことだった。

全共闘の組織原則は、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の民主集中制を逆転させたものとなっているが、それはどのようにして思いつかれたのか？ 天安門の学生たちのように、自然発生的な大衆運動の場合、こうした組織原則は普通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もうひとつの可能性は、日本の伝統である。その昔、千年以上も前の平安時代の僧兵たちは、武器を手に手に満寺集会を開いたあと、デモ行進をして首都警備の武士たちと衝突した。中世の僧兵から近世の百姓一揆を経た古い記憶が、全共闘によみがえ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4. 民主主義と暴力

全共闘は、教室をバリケード封鎖して授業ができないようにした。のちには戦術を「全学バリケード封鎖」に拡大して、研究室や事務棟も封鎖し、大学の機能を停止させようとした。

封鎖は、闘争の手段というよりも、目的だった。当時、新左翼各派は、王子や羽田、防衛庁周辺などで派手な街頭闘争を繰り広げ、組織の拡大をはかっていた。機動隊ともみあい、いっばしの革命家を気取っても、大学に戻れば日常的な生活が待っている。六〇年安保を闘った学生たちも、「挫折」し「転向」して、企業に就職していったではないか。そんな闘争は嘘だと、多くの学生たちは思った。自分の生活するその場で、変革のための闘争を組織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封鎖は、学生たちの生活の場を非日常の空間に変換するために、必要なのだった。

同じ理由から、「自己否定」が、全共闘の合言葉になった。受験の波にのまれて大学を目指すし、何の反省も経ぬまま資本主義社会の歯車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た自分。それを否定する集合的な自己変革の運動が、全共闘であるとされた。政治運動ではなく、いわば一種の思想運動である。となれば、個別の闘争目標を掲げていても、大学当局と妥協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どの大学の全共闘も例外なく、機動隊に排除されて敗北していかざるをえなかったのは、ここに原因がある。

もうひとつ、暴力に対して、全共闘はどういう態度をとったか。

新左翼各派（フロントを除く）は、日本共産党が暴力革命路線を放棄したのに反対し、暴力革命を標榜する。加えて、ヘルメットを被りタオルで覆面、ゲバ棒（角材）をふるって機動隊と衝突するという闘争スタイルを編み出した。投石や角材で革命ができるわけではないが、戦術としては画期的なものと受け取られた。

全共闘は、ゲバ棒にヘルメットという、新左翼の闘争スタイルを取り入れた。それは全共闘が、暴力（実力による闘争）を否定し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全共闘の無期限スト＋封鎖戦術は、自治会の学生大会や代議員大会の決議（学生の多数意思を反映する民主的な手続き）にもとづくものだ。しかし全共闘は、学生自治会のあり方を、手続きを絶対化するものと批判し、「闘う学友」の集まりである全共闘にすべての権力を集中した。たとえ全共闘が少数派になろうと、実力でバリケード封鎖を守りぬく。無期限ストに反対するものは、自己否定の足りない学生であるから、自分の態度は倫理的に正当化できる。——この決意と確信が、全共闘の「暴力」を支えていた。

全共闘の暴力は、①大学当局、②敵対する勢力（特に日本共産党系の学生組織）、③自分自身（否定すべき内面）、の三つに向けら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共産党系の学生たちとは何回も衝突を繰り返したが、それは組織的な実力行使に限られ、個人を標的とする無差別テロに至ることはなかった。総じて言えば、全共闘の暴力は、観念的で象徴的なものだった。この点が、本物の階級闘争という位置づけで武闘に突入した紅衛兵の文化大革命とは、異なっていた。

新左翼各派の関係は、七〇年安保闘争の主導権争いのため、当時ますます険悪になりつつあったが、全共闘がそれを抑えていた。新左翼各派にしてみれば、全共闘は新たな活動家を調達するのに恰好の場だったから、全共闘との関係を悪くしたくない。全共闘にしてみれば、デモやバリケードはお手のもの、いざとなれば外人部隊（他大学からの応援）を送ってくれる新左翼各派は、重宝な存在だ。もちつまたれつ、だが牽制しあう関係が、そこにあった。

たとえば、六八年九月に、早稲田大学での内ゲバから飛火して、東大でも解放派と革マル派が衝突する騒ぎがあった。このときは全共闘が仲裁に入り、内ゲバを続けるなら両派を出入り禁止すると警告して、収まった。各派は、呉越同舟の関係にありながらも、全共闘が存続しているあいだは、表立って自派のエゴを押し通そうとはしなかった。

全共闘は、大学を基盤にした運動だったから、機動隊に大学を追われ授業が再開されて

しまつと、運動として成り立たなくなった。新左翼各派は、全共闘を見限って、独自の運動を再開した。

5. 赤軍派、連合赤軍、爆弾グループ

新左翼各派は、七〇年安保闘争を最大の政治目標としていた。六〇年安保が革命に結び付かなかったのは、前衛党の適切な指導がなかったせいである。七〇年にその役割を果たすものこそ自派であると、どの派も称していた。

しかし七〇年安保は、空振りする運命だった。まず、七〇年の前哨戦・全共闘運動が、潰滅した。つぎに、六〇年に改訂された(国会の批准が必要だった)日米安保条約は、七〇年には自動延長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ており、国会での討議も採決も必要なかった。社会党も共産党も、六〇年と違って本気で取り組む気がなかった。さらに、国民は六〇年代の高度経済成長に満足しており、学生の夢想する革命に関心がなかった。機動隊の警備も厳重で、新左翼各派は完全に押さえこまれてしまった。

仕方がないので各派は、成田空港反対闘争などに、目標を切り換えた。成田闘争の位置づけはあいまいだが、空港に反対する農民の拠点があり、街頭闘争がやりやすい。

内ゲバも続発した。中核派、解放派、革マル派など、各派のトップクラスや末端の活動家が、反対派に襲撃されて、殺害されたり重傷を負ったりした。血の報復がエスカレートし、新左翼は殺人集団として恐れ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大学では、新人の勧誘も困難になった。

七〇年代になり、人びとの新左翼離れを決定づける事件が、立て続けに起こった。

最初は、赤軍派のよど号ハイジャック事件である。

赤軍派は、世界同時革命を呼号していたが、山中で武闘訓練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を一網打尽にされてしまった。残った幹部が一九七一年一月、日航機・よど号を乗客もろとも乗っ取り、北朝鮮へ亡命したのがよど号ハイジャック事件である。日本国内に可能性を見出せなくなった彼らは、パレスチナや北朝鮮に革命の希望を託すしかなかったのであった。

連合赤軍・あさま山荘事件は、より大きな衝撃を与えた。

一九七一年一月、赤軍派の残党と、過激な小グループ・京浜安保共闘とが合体した「連合赤軍」が、人質をとって保養所・あさま山荘に立てこもり、包囲した警官隊と銃撃戦を

展開した。その後の捜索の結果、この集団が、山中のアジトで、名の同志を殺害、死体を埋め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た、という事件である。この事件の異様さは、二〇人にも満たない小グループが、本気で革命(武装蜂起)を実行するつもりであったこと、さらに、革命への献身が十分でないという理由に仲間の半数を殺してしまったことである。たとえ少数者となっても、革命の理想を追い求めるという新左翼の論理をつぎ詰めると、このような結末にならざるをえないことを実感して、それまで新左翼に共感を寄せていた人びとも愕然とした。

もうひとつは、三菱重工爆破事件である。

一九七一年一月、何者かが仕かけた手製の爆弾が東京・大手町の三菱重工本社ビルで爆発、人の死者と大勢の負傷者を出した。捜査の結果、逮捕されたのは、少数数のアナキスト・グループ「東アジア反日武装戦線」である。犯人の一人はたまたま、私の中学の同級生であったが、全共闘の波に遅れて大学に入学し、資本主義社会を拒絶したいとする感情と、自己を浄化・救済したいとする心情にかられて、無差別テロに及んだものであった。自分の信念に忠実に行動し、手段を選ばなければ、爆弾犯になるしかない。自分の信念はそんなに正しいものなのか。——左翼的価値観・世界観に対する懐疑が、少なからぬ人びとのあいだに広がった。

これらの事件が、新左翼や全共闘のような「左翼」の将来性に、とどめを刺したと言ってもよい。

新左翼と全共闘は、もちろん同じでない。新左翼各派はマルクス主義の原則(前衛党の指導による革命)を信じていた。日本共産党が前衛党の任務を放棄したので、それにとって代わろうとしただけである。その点では、名前こそ「新」左翼だけれど、新しいところは特にない。いっぽう全共闘のほうは、「前衛党」の必要をもちや認めない。前衛党の指導なしに、革命が可能であると考えたふしがある。(それにしても、前衛党を自任する新左翼各派の存在を否定しなかったところが、不徹底と言えれば不徹底であった。)

前衛党なしに革命を行なおうとすれば、大状況に背を向けて、小集団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実験に閉じこもるか、さもなければ、小集団のまま大状況に革命への意志をぶつけるしかない。前者の試みは、無数に現れたが消えていった。後者の極は、連合赤軍や爆弾テロ・グループであると思われた。全共闘は、単に機動隊に排除されただけではなく、思想的にも行き詰まったのである。

六〇年代、日本では、紅衛兵の文化大革命は肯定的に評価されていた。社会主義国でなお革命が可能なら、それは、硬直した党官僚と戦う永久革命への志向、個々人の自律した意思によるものであろう、と誤解されたのだ。実態は、マルクス主義の原則からも逸脱した、個人崇拜の産物であった。新左翼や全共闘では、スターリン主義批判は当然の前提となっていたため、文化大革命の実態に思い及ばなかったのだ。

6. 紅衛兵と新左翼

似ている点よりも異なっている点のほうが多いとは言え、中国の文化大革命と、日本の新左翼・全共闘の運動とのあいだには、同時代であるがゆえの共通項を見つけることもできる。

まず第一に、どちらも、米ソ冷戦構造を前提にし、そのもとでのソ連の役割に異を唱えるものであること。

中ソ論争と文化大革命の関係については、冒頭でのべた。中国共産党は、近代化の過程で、①ソ連に学ぶ②自力更生③外資の導入、の三つの経済発展の方策を順に試してみ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のうち、②の時期にあたるのが、文化大革命（すなわち、中国の国内に存在する権威を最大限に利用する試み）である。

冷戦（米ソの力の均衡）は、マルクス主義の公式に合わない事態だった。新左翼は、日本共産党の権威のみか、ソ連共産党の権威も否定する。米ソが均衡し、ソ連が世界革命の目標を放棄した（とみえる）からである。それには、自己の正統性を主張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これが、新左翼の反スターリン主義である。いっぽう中国は、スターリン批判に反対し、スターリン主義を唱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が、冷戦下のソ連の正統性を否定するという点では同じである。

第二に、その反動として、反米の要素が相対的に弱まったこと。

文革の初期に、中国は、農村で都市を包囲する戦略を世界に拡大し、第三世界で先進国（アメリカ）を包囲するという世界革命の図式を描いてみせた。この図式は、主要敵をソ連と見た毛沢東が米中復交を決断したことにより、修正された。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が優先され、反米帝国主義とプロレタリア国際主義が犠牲にされるかたちとなった。

日本の新左翼は、日本とアメリカが軍事同盟を結んでいる限り、日本革命は不可能に近いという事実を、正面から検討した様子がない。赤軍派は、国際ゲリラ組織に脱皮するこ

とで、日本革命を事実上放棄した。それ以外の各派は、革命の展望が開けないことを、他の党派の反革命的裏切りのせいにしてしている。冷静に考えれば、日本革命のひとつの可能性は、階級闘争を反米ナショナリズムと結びつけることであろう。しかしこれでは、日本共産党の路線と似てくるので、彼らは採れないのである。

第三に、どちらも、大衆の叛乱にもとづいてのみ成り立つ運動であったこと。

文化大革命は、計画経済の教科書どおりにことを進めるソ連派・修正主義者も、市場経済の実験を試みる走資派・現実主義者も、両方とも打倒してしまう運動だった。米ソ対立のはざままで国家を運営する党官僚は、このどちらかであるしかない。党機構をすべて破壊するとなれば、必然的に、その正しさの規準は、党を超越した毛沢東、および、毛の指導に呼応した一般大衆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たしかに毛の指示と権威は上からのものだが、それが現実の力となるには、それに呼応する大衆が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全共闘は、党派（前衛党）の存在を否定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革命の理想を信じた。とすれば、党派の指導を受けずに、大衆が自ら立ちあがるしかない。冷戦の反映である、保革の対立——自民党とも、社会党・共産党とも無縁なところで、そして新左翼とも無関係に、立ちあがる大衆。そういう大衆は、大学のなかにしかなかった。

このように考えてみるなら、紅衛兵の文化大革命も、日本の新左翼・全共闘も、世界革命のエネルギーが冷戦の壁に阻まれた一時期、それでもなお純粋な革命の理念を一国内で追求した運動、と理解できる。どちらも非現実的で、革命の条件を欠いていたことで、自壊し、暴力に明け暮れるうちに、人びとの信頼を失っていったのであった。

* "Red Guards and Zenkyoto :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of Japanese New Left in 1960s", by Daisaburo HASHIZUME May 1996